

卡夫卡《变形记》中的身份困境、伦理悲剧与空间书写

The Identity Dilemma, Ethical Tragedy and Spatial Writing in Kafka's *The Metamorphosis*

方 英 (Fang Ying)

内容摘要: 卡夫卡的一生受到伦理(身份)困境的折磨,其代表作《变形记》以精妙的情节编织和空间书写展现了他对伦理问题的深刻思考。变形后的格里高尔由于身体外形的巨变、语言表达的能力的丧失和理性思维的逐渐衰弱而陷入无法解决的身份困境,并导致了家庭内部的伦理混乱。面对此困境,格里高尔与家人做出了不同的伦理选择,这些选择既是对当时伦理语境的不同反应,也是出于格里高尔与家人之间完全冲突的伦理观念。这些无法调和的伦理冲突最终导致家人将格里高尔视为“非人”,排除出人的伦理范围。而“非人”并非格里高尔的身份认同,因而他只能选择死亡以解决变形带来的伦理混乱。小说以格里高尔的身份困境为伦理结,以他和家人的不同伦理选择为伦理线,展现了一场无法避免的伦理悲剧。同时,小说中的身份困境、伦理选择、伦理观念的对立、格里高尔与伦理语境的冲突等,都是在详细的空间书写(对空间知觉、空间对比、边界空间、边界跨越的书写)中展现的,从而揭示了人的伦理存在、社会中的伦理问题与空间的紧密关联。

关键词: 《变形记》; 身份困境; 伦理选择; 伦理语境; 空间书写

作者简介: 方英,文艺学博士,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和英美文学批评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学空间批评研究”【项目批号:17BZW057】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Identity Dilemma, Ethical Tragedy and Spatial Writing in Kafka's *The Metamorphosis*

Abstract: Kafka has been tortured by his ethical (identity) predicaments for the major part of his life, and *The Metamorphosis* embodies his profound reflections on ethical issues through its exquisite plot knitting and spatial writing. Gregory, after his metamorphosis, with his dramatic corporeal transformation, loss of linguistic expression and ever-weakening reason, is confronted with an identity dilemma, which causes the ethical confusion in his family. Different ethical choices are made by Gregory and his family, which not only are their different reactions to their

ethical context, but also originate from their contradictory ethical views. These irreconcilable ethical conflicts eventually lead to his family's choice of seeing him as "nonhuman" and excluding him of human ethic. But nonhuman is not Gregory's choice of identity, so he can only choose death to resolve the ethical confusion brought about by his metamorphosis. Thus, the novella discloses an inevitable ethical tragedy, employing Gregory's identity dilemma as the ethical knot, and his and his family's different ethical choices as the ethical lines. In the meanwhile, the identity dilemma, the ethical choices, the conflicts between different ethical views and those between Gregory and the ethical context, are represented in the detailed spatial writing, namely, the writing of spatial perceptions, spatial contrasts, the border space and border-crossing, thus revealing the close association between space and human ethical existence and social ethical issues.

Key words: *The Metamorphosis*; identity dilemma; ethical choice; ethical context; spatial writing

Author: Fang Yi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2, China). Her scholarly interests include literary theories, spati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ttbetty@126.com).

卡夫卡的一生受到伦理（身份）困境与空间焦虑的折磨。在身份认同上，他始终处于难以界定的尴尬境地。“他到底属于哪里呢？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不属于基督徒世界；作为一个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不算自己人。作为一个说德语的捷克人，却不属于捷克人；作为一个说德语的犹太人，却不属于波西米亚德国人。作为一个波西米亚人，他不属于奥地利人……”（Anders 18）。他似乎属于各种身份，却又什么都不属于。像许多犹太人那样，他始终是个流浪者，外来者，他者，一个“无家可归的异乡人”（Brod 179-180）。尽管他是犹太裔，却“生于布拉格，葬于布拉格，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布拉格，……却不属于布拉格，更不属于捷克”（曾艳兵 40）。布拉格原先属于奥匈帝国，后来又由于帝国崩溃而被划归捷克斯洛伐克。和大多数在世界各地漂泊的犹太人一样，空间上的归属也是卡夫卡一生的困境。

身份问题是卡夫卡作品中最重要主题（Golomb 273），伦理问题在其作品中具有首要地位（281）。卡夫卡的作品为许多伦理问题提供了思考和洞见，如道德距离和伦理暴力（Huber），官僚主义、权力、权威、理性和异化（Warner）。其作品也表达了作者深刻的空间意识，为 20 世纪的空间理论研究提供了洞见和绝妙的解读文本，如其作品中关于异托邦和全景敞视空间的建构（Shah）、关于空间书写与身份的关系（Nicolae）。他的大多数作品表现了他的伦理困境和伦理反思，而且将伦理问题与空间书写紧密结合在一起，如《城堡》、《诉讼》、《美国》、《在流刑营》、《地洞》等。其代表作

《变形记》则通过精妙的情节编织和空间书写，探讨了身份困境、伦理选择、伦理冲突、伦理悲剧等问题。

一、身份困境

“《变形记》是一个关于伦理的故事”（Rhodes 236）。故事的核心伦理问题产生于格里高尔变形后的身份困境——难以界定他的身份，他本人身份认同的两难处境，以及他与他人关于他身份的矛盾态度。

格里高尔的变形出现在故事的开端，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背是铠甲式的硬壳，肚子高高隆起，长着无数细小的腿。在身体外形上，他显然变成了“非人”的虫子。但他同时具有人的记忆、感知能力和思考能力。他能辨认自己的卧室和家具，能记得过去的经历，拥有人的各种思想和情感——厌恶工作，担忧迟到，以及对职业、早起、家庭责任等问题的理性思考。就思想和精神层面，他显然具有人的特征。约翰·洛克认为，人“是一种具有思维能力的思考着的存在，具有理智和思想，能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将自己看作同一个思维存在……正是意识使得每个人成为他所称的‘自我’……只要这种意识能到达过去的任何行动和思想，该意识也就能到达此人的身份……”（Locke 448-49）由此可见，意识，尤其是对过去的意识，是界定人的自我和身份的关键。对过去的意识，即人的记忆。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记忆对于他/她的身份确认是关键因素。安东尼·奎因顿指出，洛克显然赞成笛卡尔的二元论，即自我有可能独立于最初的身体而存在（Quinton 396-397）。格里高尔在变形之初，拥有人的记忆和各种思想情感。从洛克的理论来看，格里高尔此时具有人的身份，他的自我“寄居”在变形后的身体中。他本人也将自己看作原先的格里高尔，还思考着如何挣扎着起床去赶火车，如何行使作为公司职员和家庭成员的各种责任。

然而，他身体外形的变化的确导致了他的身份困境。伊丽莎白·格罗斯指出，身体作为一个物质性肉体整体，通过对其表面的心理书写和社会书写逐渐形成“人的身体”（human body），这既需要家庭所规范的性欲对身体的书写和编码，也需要社会的规范和长期管理，将一系列社会编码的意义刻写在身体上，使身体成为社会网络的一部分（Grosz 104）。由此可见，身体的巨变必然影响人的存在方式乃至人在社会网络中的角色和身份。格里高尔身体变化中最关键的是，他的运动姿势从直立（行走）变成了平卧（爬行）。段义孚指出，直立和平卧生产出两个相反的世界：直立意味着对抗重力和其他自然力量，创造并维持一个有序的人类世界；而平卧则意味着向自然力屈服并离开我们所创造的世界（Tuan 36）。可见，直立是人的身体姿势的关键特征，对于人建构所处世界的秩序、维持人的身份至关重要。格里高尔从直立到平卧，是从人的姿势退化成动物的姿势，这意味着他难以再经验人类世界的秩序，难以再维持人的身份。

身体外形的变化还导致他空间知觉的变化,以及与此相关的身份危机。首先是肌肉运动知觉的变化。变形之始,他难以控制自己的身体,难以完成翻身、站立、开门等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简单动作。他始终无法照料自己的生活起居,更不必说劳动这样的复杂生产行为。这意味着他远离了人类社会秩序,不再属于人类社会空间,丧失了劳动者、家庭支柱乃至正常人的身份。其次,他的视知觉日益衰弱。他变形没过几天,“那些离他稍微远一点的东西,已一天比一天模糊了”;他所见到的窗外,“一切都是灰蒙蒙的,天和地混成一团”(卡夫卡 19)。视力的变化改变了他所能感知到的世界,也改变了他与世界的关系。段义孚指出,肌肉运动知觉、视知觉和触觉是空间知觉中至关重要的知觉力,决定着个体对空间和空间特征的感知和体验,以及空间意识的建立(Tuan 12)。这两种空间知觉的巨变必然导致他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原先作为人的空间体验,因而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他的身份困境。

更重要的是,他的甲虫外形令他难以被家人接受,难以被其他社会成员认同为“人”。他与家人的身体差异令家人难以将他看作同类,其中最重要的差异是他没有人脸。列维纳斯(Levinas)认为,拥有人脸是伦理的核心。拥有人脸,是身份和同一性的来源(Rhodes 243)。而格里高尔变形后却失去了人脸,失去了与他人的同一性。当他出现在众人面前,立即引起一场混乱,母亲晕厥,协理大叫一声捂嘴后退,父亲握紧拳头满脸敌意。显然,他们难以将眼前的“怪物”当作一个“人”来看待。他的自我身份认同和家人对他的认同产生了矛盾。

此外,笛卡尔认为,有目的的行动和对语言的理性使用是理性意识的标志(Sweeney 25)。也就是说,“人”的身份取决于理性的行动和语言表达。格里高尔的困境恰恰在于很快丧失了人的语言能力——确切地说,用于交际的口头表达能力。他能用语言思考,但他所说出的只是虫子的声音,他人完全无法理解他的“语言”。“您二位听懂他哪怕一句话了吗?”……“这是动物的声音!”(卡夫卡 8)公司协理指出他发出的不是人的语言。语言能力的丧失动摇了他人对于他“人的身份”的接受。

最重要的是,即便在思维方面,他也越来越远离人的特征。他的理性意识越来越弱,渐渐丧失记忆,逐渐难以真正理解自己的行为模式变化的意义。比如,在第二部分的开头,他向卧室的门爬去。“但到了门旁他才发觉,把他吸引到那里去的究竟是什么了,那是某种吃的东西的味道”(卡夫卡 13)。他的这一行为,与其说是出于清醒的自我意识,不如说是出于本能。又如,当妹妹和母亲来搬走家具时,他一开始并不十分清楚这些意味着什么,自己应该如何反应,因为“两个月来他没有跟人直接交谈……他肯定被这种状况搞糊涂了……他现在真的快要把过去的一切忘光了”(22)。

“人是一种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人性概念的阐释和考辨”14)。“斯芬克斯因子”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有机组合

在一起。“人性因子即伦理意识”，“伦理意识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分辨善恶的能力”；“兽性因子是人在进化过程中的动物本能的残留，是人身上存在的非理性因素”（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6）。“其中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兽性因子是低级因子，因此前者能够控制后者，从而使人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5）。也就是说，人的本质特征在于：理性能控制非理性，并因此具有伦理意识。而格里高尔的身份困境在于：他身上的理性因素越来越少，非理性因素越来越多，却依然具有一定的伦理意识，保持着对家人的爱和关怀；他自我认同为人，家人与其他人却难以接受他作为人的身份。

二、伦理选择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体系来看，格里高尔的身份困境构成了小说的伦理结，小说中的所有矛盾冲突都围绕这个伦理结展开，并构成小说的数条伦理线。“伦理结是文学作品结构中矛盾与冲突的集中体现。”（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8）伦理线是将伦理结串联起来的“文学文本的线形结构”，是“贯穿在整个文学作品中的主导性伦理问题（leading ethical track）”（265）。伦理结与伦理线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作品的伦理结构。《变形记》的伦理结构由格里高尔的身份困境、他和家人的不同伦理选择、以及由此引发的矛盾冲突编织而成，而其中的伦理主线则是格里高尔与家人的伦理选择过程。

格里高尔的变形，本身就是一次伦理选择。变形是一种逃避，逃避他所憎恨的工作。变形也是一种试探，试探众人的态度和伦理底线。当他挣扎着想要打开卧室的门，他“确实想让人看见并和协理说话，他好奇地想知道，那些现在想见他的人见到他时会说些什么”（卡夫卡8）。变形也是他内心愿望和欲望的表达。一方面，甲虫喻指他对妹妹的乱伦冲动（Ryan 148），或者说爱情的欲望。在小说中“卡夫卡正是把妹妹当成格里高尔的情人来加以描写和处理的”（李军94）。另一方面，这喻指格里高尔想要放弃工作，像甲虫那样，在经济和生活上都由家人照料，从而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艺术。格里高尔爱好艺术：他喜欢音乐，喜欢自己制作相框。文中三次提及墙上那个由他制作的美丽相框，而故事的高潮则是音乐对他的吸引。格里高尔的变形是放弃之前的伦理身份，追求内心的欲望和爱好，选择与此相符的伦理身份。

然而，格里高尔的变形，不仅导致其身份困境，而且导致整个家庭的伦理混乱。原有的伦理秩序改变了：格里高尔无法再履行哥哥、儿子、家庭经济支柱的伦理义务，反而在经济上与生活上变成了家人的拖累。这些问题必然要求全家人做出新的伦理选择，以重构处于混乱状态的伦理秩序。然而，对其身份界定的困境却决定了重构家庭伦理秩序的困境，也导致了一场艰难

的、充满矛盾冲突的伦理选择。

当格里高尔发现自己的变形令全家和公司协理都深感惊恐，尤其是发现自己的新身份受到父亲手杖的驱赶和攻击，他意识到无法彻底做那个内心欲求的“自我”，也无法回避变形后的伦理与责任问题。于是，他试图选择另一个伦理身份，试图重新建立与他人（主要是家人）的关系，重构自己作为家庭和社会成员的身份。

起初，他的选择是消极地忍耐、躲避和等待，并一如既往地暴露真实的（作为“虫子”的）潜意识：他钻到沙发底下，安静地躺着，告诉自己要“用耐心和最大的体谅来减轻家人由于他目前的状况而引起的倒霉和难受心情”（卡夫卡 15）；当妹妹开窗惊吓到他，他只是被动地“躲在沙发底下瑟瑟发抖”（19）；对于妹妹态度的变化，他无法做出理性的分析和思考，反而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妹妹有可能，她一定……乐于在关好窗门的情况下照料他的”（19）——这种一厢情愿折射出他的乱伦欲望和物质上依赖家人的愿望；当他发现他的样子仍然让妹妹受不了，他选择了“自我隔离”——把一块床单驮到沙发上，“使它完全能够遮住自己”（20）。后来，当妹妹决定搬走他房间的家具，而母亲表示搬走了家具就表明大家放弃他病情好转的希望，他突然意识到必须令房间保持原样，以保持他对过去的记忆。但他却无法表达自己的思想，也无法采取理性而有效的应对措施，只是做出本能的选择：他爬到一副女士画像上（相框是他自己制作的），“把身体紧贴在玻璃上，玻璃吸附住他发热的肚皮，使他感到舒服”（性欲的暗示），甚至不惜与妹妹对峙，“宁可跳到她的脸上也不让他的画被拿走”（23）；当母亲昏厥，他又爬到隔壁房间，“好像他还能一如往昔给妹妹出个什么主意似的”（24）。最后，妹妹的琴声吸引他爬进客厅，他希望妹妹带着小提琴到他的房间，并且不愿让她离开，“至少他活多久，就让她在这里待多久”，而且准备守卫房间的各个房门，“对着入侵者们吼叫”（32）。这象征着他为本能驱使——既有对艺术的热爱，也有对妹妹的欲望——忘记了自己应该安守的被隔离的伦理身份，并准备彻底以非理性的欲望示人，以社会所无法接受的“本我”对抗当时的社会伦理秩序。

他的这些选择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坚持过去的记忆，继续将自己认同为人，尤其在情感上继续坚持家庭成员和经济支柱的身份；另一方面，他无法摆脱虫子的身份——内心对妹妹和艺术的欲望，以及摆脱推销工作的欲望——而且任凭这一欲望逐渐主宰自己，逐渐击退理性思维。因此，他不可能建立一个统一而连贯的新身份。此外，这些选择既无法建立交流和沟通，也无法承担责任和义务，反而加剧了他与家人之间的隔阂与误解。显然，他的选择注定无法得到家人的理解和认同。根据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自我由各种社会角色的联系所建构，由特定的社会交流形式产生，因此，个人身份是通过建构社会关系得以维持的，无法建构社会关系，即便具备心理或物理

层面的连续性，个人身份也遭到破坏（Sweeney 29）。在社会环境中，没有得到他人——尤其是家人的承认，他的身份重构是失败的，他的伦理选择也无法得到认可。

格里高尔在矛盾与困境中做出伦理选择的同时，他的家人也在做出艰难的选择。起初，他们并没有马上将他认定为“异类”，却也难以把他看作原先的那个身份。他们仍然把他看作格里高尔，一个严重病态、令他们厌恶和恐惧的格里高尔，并期待他康复，变成原来的“自我”。因此，家人将他驱赶并禁闭在他的卧室。此时，家人的选择是隔离、（暂时的）照料和等待。当妹妹发现他饮食习惯的变化，给他带来各种食物供他挑选，这实际上是让他选择身份。他对过期食物的选择让家人意识到他对虫子身份（本我）的坚持，因而日渐失望。当妹妹决定搬空他卧室的家具，实则是彻底否定他过去的身份。显然，家人的选择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由隔离和等待到失望和圈禁，再到放弃并否定他作为人的身份。

这一艰难而具悲剧色彩的伦理选择过程在小说的空间书写中得到了精彩而深刻的展示，尤其是对格里高尔卧室空间的书写。小说将这个卧室书写成一个圈禁、监控和异化的“他者”空间，在此空间展示格里高尔与家人的不同伦理选择。卧室本来是家的一部分，给人以温馨和庇护。在哺乳动物中，只有人类将家看作供病人和伤者在他人照料下康复的地方（Tuan 137）。在巴什拉看来，家宅是庇护所，藏身处，充满安定感、幸福感与儿时的梦幻（巴什拉 1-16）；家宅既是回忆，又是展望，既是休息的地方，又是腾飞的地方（39-71）。然而，格里高尔变形后，卧室失去了家的一切美好意义，被家人变成囚禁动物的他者空间。家人不允许他随意进出卧室，常常用关门的方式实现对他的圈禁。家人经常在卧室门外听门内的动静，或者随意开门对其观察。后来，家人逐渐忽视对房间的打扫，任其变得肮脏凌乱；挪走卧室的所有家具和他的个人物品，将这彻底变成动物的巢穴；有了租客之后，又将这变成堆放杂物的储物间，将他等同于堆放于一室的杂物。家人将卧室逐步异化和他者化的过程，也是将格里高尔逐步物化、他者化、非人化的过程，也是他们的伦理选择变化的过程。

三、伦理冲突

格里高尔与家人做出了不同的伦理选择，他们的选择过程呈现出动态的矛盾对立性。这些对立植根于他们不同伦理观念的对立，并导致了小说中一系列伦理冲突。小说中的身份困境、伦理选择和伦理冲突都是处于特定伦理语境中的。因此，理解该语境是解析小说伦理冲突与伦理悲剧的关键。

伦理语境是“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意识、思考、观念和语言交流的伦理环境”（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70）。当时的伦理语境，有两点与小说中的伦理冲突密切相关。其一，从人类文明之初，乱伦禁忌就被确立为

最重要的两大伦理禁忌之一（261-62），因而，当时的伦理语境绝对不容许兄妹之间的乱伦关系，也不允许兄长公开显露对妹妹的乱伦欲望。其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北欧，尤其是在卡夫卡所在的欧洲犹太人移民居住区，家庭责任和对父母的孝道是其社会文化的基础（Rhodes 241）。成年男性应当赚钱养家，孝顺父母，照顾弟妹，这是当时北欧犹太族群的伦理语境。在解读当时伦理语境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变形记》中具有两种无法调和的伦理冲突。一是格里高尔的伦理身份、伦理选择与伦理语境之间的冲突；二是格里高尔与家人伦理观之间的冲突。

先看第一种伦理冲突。如前文所述，格里高尔变形后，丧失了劳动者、家庭支柱乃至正常人的身份。他的变形，在本质上，是选择完全依赖家人——尤其是依赖于妹妹的照顾，是显示自己对妹妹的情欲。在后来的选择中，他虽然坚持自己作为人的身份，但却不愿放弃内心的欲望，也无法承担应尽的家庭责任。因此，他的伦理选择和新的伦理身份不仅违背了乱伦禁忌，而且放弃了“建立在替父还债义务基础上的社会身份”（Preece 37），违背了欧洲犹太族群的伦理规范，是与当时伦理语境的根本性冲突。

再看第二种伦理冲突，即格里高尔与家人伦理观之间的冲突。格里高尔的“个人”伦理观基于身体-意识二分法和对个人意志、情感因素的强调。他的伦理选择表明：他认为伦理身份在于人的意识和情感可以独立于身体的物质状态，家庭伦理关系的核心是心中无条件的爱和包容——他自己对家人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并期盼家人以这样的原则对待自己。而以家人、公司协理和租客为代表的社会伦理观（也是当时伦理语境的基础）则主张伦理关系的社会-建构性和犹太文化特征，即伦理处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每个人的伦理身份都对应着相应的义务，尤其是对家庭的责任和对父母的孝道。显然，这两种伦理观念是根本冲突的。

这些伦理冲突，被深深地镌刻在小说的空间书写中。小说中卧室内、外的空间对比，以及由边界异化、边界跨越引发的“空间性”冲突，揭示了两种伦理观念、两种伦理秩序的根本对立，以及由此导致的种种伦理冲突。

首先，卧室内与窗外的空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卧室是困境、圈禁、他者空间；窗外则是自由、希望、常规空间。卧室是私密的个人空间，代表着格里高尔个人的伦理观念；窗外是公开的社会空间，是公共伦理规范、伦理秩序与伦理体系所处的空间。变形后的格里高尔无法走出自己居住的公寓，无法再走进窗外这片广阔的空间。本来窗户是连接并沟通室内与窗外空间的通道，是“将外面的世界带到近处的途径”（Nicolae 146）。但格里高尔衰退的视力令他无法再看见窗外的景象。窗因此变成了“伪沟通”和“归属幻觉”的象征（146）。这些都象征着他无法再融入人类社会空间，无法再进入社会伦理秩序，无法在这个伦理体系中保持或获得一个伦理身份。两种空间的对比和窗户功能的失效，深刻地揭示了两种伦理观念、伦理秩序的对立，以及

沟通、妥协的不可能性。

其次，是卧室与客厅之间的空间对比。客厅是家人活动的公共空间，是家庭内部的社交空间，比卧室具有更多的关系性和互动性。格里高尔作为家庭一员，本来也有权进入这个空间，享有这个空间里亲人间的相聚与交流。但，变形后的他被排除在这个空间之外。客厅与卧室变成了相互对立的矛盾关系。如果说卧室属于怪物和他者的空间，是伦理关系的异化，那么，客厅才是正常人的空间，遵循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这两个空间，代表着两种对立的伦理秩序，也象征着格里高尔与家人伦理观念的对立。两种空间的对立将格里高尔的伦理困境、他与家人之间的伦理冲突空间化，结构化，物质化。

再次，空间跨越引起的伦理冲突。客厅与卧室虽然是家庭空间中公共空间与私密空间的两级，但可以通过门互相跨越与沟通。门是这两个空间的边界，既分隔出两种空间功能，又为家人之间的空间跨越、身份转换与情感交流提供了通道。苏贾通过讨论混血身份、混血艺术、对领土的穿越、对族裔的跨越等问题，将边界空间视为第三空间的一种，并援引纪勒莫·格梅兹帕、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的思想，揭示出：边界既是边缘，又是重叠与混合；既是裂缝，又是中间和结合部；是穿越、变数、对立与共生，是超越与解方向性；边界作为第三化的他者而永远开放，永远具有无限可能（Soja 125-144）。然而，格里高尔变形后，门这个边界的功能与意义发生了巨变。变形之初，他卧室的锁着的门是一个重要的空间象征。这道门，家人无法从外面打开，他也难以从里面打开。锁着的门造成了他与家人之间物理空间的分离，也是两个不同世界的分离，两种伦理观念和伦理秩序的对立。此后卧室的门，主要发挥着禁闭与隔离的功能，变成了维持秩序和禁止跨越的森严边界。门的开和关由家人和帮佣控制。即使门没有锁上，开门和出门对格里高尔而言也是困难的。而且，当家人有意开着门，门也已经失去了沟通和跨越的意义，“格里高尔依然是门外面的人，观察着门的另一边的生活”（Nicolae 148）。而且，他几乎每次进门或出门都会受伤，每次跨越边界都引起混乱，并遭到父亲的驱赶甚至攻击。他最后一次跨越边界直接导致妹妹消灭他的坚定决心。这一方面是家人已濒临绝望，而更重要的是他这次不仅跨越了家庭内部的空间边界，而且跨越了更具结构性、矛盾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社会空间的边界——租客代表着更大范围的社会秩序和伦理语境。这次边界跨越跨过了社会伦理规范的极限，是对人类基本伦理秩序的威胁和破坏，因而直接导致家人否定了他在家庭中（也是人类社会）的伦理身份和伦理地位。

总之，卧室内、外之间的空间对立象征着不同伦理选择、伦理观念和伦理秩序的根本冲突。而门和窗的边界功能的异化，以及每次边界跨越必然导致混乱乃至暴力冲突，都表明这两种伦理观念无法共存和妥协。

四、伦理悲剧

格里高尔的伦理身份、伦理选择与当时伦理语境的根本冲突，他与家人不同伦理选择之间的冲突，是无法解决的两难困境。因而，伦理悲剧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

在激烈的伦理冲突中，最不能为大家容忍的是格里高尔离开卧室的行为，这被看作对他自己伦理身份（疯子或怪物）的僭越。对此，家人选择了以暴力对待他的非理性、极度“非正常性”和“越界”行为。其中最典型的是他父亲对他的苹果攻击，而嵌入他背部并逐渐腐烂的苹果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之一。最后，当他的出现引发房客恐慌和愤怒，并威胁到家庭经济收入，家人则视他为敌人，并否定他作为人的身份。一直照顾他的妹妹在家人中做出了最坚定的决定：“一定得把它弄走。……你只需设法摆脱这是格里高尔的念头就行了。……假如它是格里高尔，那它早就该明白，人和这样的动物是无法生活在一起的，早就自动跑掉了。……可你看这头怪物，它紧随我们不放，它在害我们……”（卡夫卡 35）显然，在家人最终的伦理选择中，格里高尔已经被视为“非人”。而“非人身份”乃伦理的极限（Rhodes 243）。也就是说，他已经被排除出人的伦理范围，不再拥有以人的身份存在的资格。但“非人”并非他自己的身份认同和伦理选择。因而，最终他只能选择死亡，通过死亡摆脱自己无法确定伦理身份的困境，解决他的变形带给家人的伦理尴尬，以恢复家庭的、也是整个社会的正常伦理秩序。

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自己选择死亡（选择饿死，病死，或者放弃生的希望），还是家人对其“人”的身份的否定，或者家人的暴力攻击导致其死亡，都是令人震惊的伦理悲剧。悲剧的根源是无法解决的身份困境，是不同伦理观念的根本性冲突。

格里高尔变形之后的身份困境在于：在身体上，他既不具备人的外形特征，也无法从事人的活动，因而危及其作为人的身份；在社会关系上，他既无法建立与他人的有效交流，无法获得他人对自己伦理身份的认可，也无法再承担家庭伦理责任，因而最终无法维持与他人的伦理关系。因此，他必然被家人（以及所有人）他者化，非人化，最终被排斥于人的伦理之外。

格里高尔的伦理观念、伦理选择不仅与家人的观念和选择存在根本性冲突，而且是对当时伦理语境的背离，是对构成伦理语境的伦理规范的违背和破坏。然而，伦理毕竟是关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伦理观念必须服从社会伦理观念，必须符合社会伦理语境。格里高尔不愿放弃自己的伦理观念，在身份选择中也无法符合家人的期望和社会伦理规范的要求，就只能选择死亡，只能以悲剧解决这一伦理困境。而由于这一悲剧发生于亲人之间，在家这个亲密空间中上演，由许多空间书写的细节构成，其悲剧性则更为令人痛心，更为发人深省，也更具有普遍性意义。

格里高尔的伦理悲剧显然书写了卡夫卡本人的身份困境，也“不由得使读者想起几千年来犹太人的不幸遭遇和悲苦命运”（曾艳兵 190）。而从象征的层面看，这又折射出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人之自我的分裂与异化，以及普遍存在的现代人的身份困境。而小说中的空间书写则深刻地揭示了这一伦理悲剧与空间的关联，伦理问题在空间中的投射，以及人的伦理存在如何为空间所形塑，如何依靠空间得以言说。正如存在不可能在空间之外，伦理问题也必然与空间相关。在本质上，现代人的伦理困境也是存在困境，是一种空间性焦虑，是“在世界中存在”（being-in-the-world）的必然焦虑。

【 Works Cited 】

- Anders, Günther. *Franz Kafka*. Trans. A. Steer and A. K. Thorlby. London: Bowes & Bowes, 1960.
- 巴什拉, 加斯东: 《空间的诗学》, 张逸婧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年。
- [Bachelard, Gaston. *The Poetics of Space*. Trans. Zhang Yiji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9.]
- Brod. "The Homeless Stranger." *The Kafka Problem*. Ed.. Angel Flore.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46: 179-80.
- Golomb, Jacob. "Kafka's Existential Metamorphosis: From Kierkegaard to Nietzsche and Beyond." *Clio* 14.3 Spring (1985): 271-286.
- Grosz, Elizabeth A.. *Space, Time, and Perversion: Essays on the Politics and Bod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Huber, Christian & Iain Munro. "'Moral Distance in Organizations: An Inquiry into Ethical Violence in the Works of Kafka.'" *J Bus Ethics* 124 (2014): 259-269.
- 卡夫卡, 弗兰茨: 《变形记: 卡夫卡短篇小说集》, 叶廷芳等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 [Kafka, Franz. "*The Metamorphosis*" and *Other Stories*. Trans. Ye Tingfang et al. Kunming: Yunnan Renmin Publishing House, 2010.]
- Levinas, E. *Totality and Infinity*.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69.
- 李军: 《出生前的踌躇: 卡夫卡新解》,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 [Lijun. *A Hesitation before Birth: New Interpretations of Kafka*. Beijing: Peking U P, 2011.]
- Locke, John. "Of Identity and Diversity."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New York: Dover, 1959: 439-470.
- Nicolae, Cristina. "Franz Kafka's Metamorphic Prison: The Door and the window." *Philologia* 18.1 (2015): 143-150.
-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 《外国文学研究》6 (2011): 1-13。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Choice and Sphinx Factor."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11): 1-13.]
- :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Beijing U P, 2014.]

—: “文学伦理学批评: 人性概念的阐释和考辨”, 《外国文学研究》6 (2015): 11-19。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e Exposition and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Definition of Human N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2015): 12-22.]

Preece, Julia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fka*. Cambridge: Cambridge U P, 2002.

Quinton, Anthony. “The Soul.” *The Journey of Philosophy* 59.15(1962): 393-403.

Rhodes, Carl, and Robert Westwood. “The Limits of Generosity: Lessons on Ethics, Economy, and Reciprocity in Kafka's *The Metamorphosis*.” *J Bus Ethics* 133(2016): 235-248.

Ryan, Michael P. “Samsa and Samsara: Suffering, Death, And Rebirth in *The Metamorphosis*.” *The German Quarterly* 72.2 Spring (1999): 133-152.

Shah, Raj. “Urban Panopticism and Heterotopic Space in Kafka's *Der Process* and Orwell's 1984.” *Criticism* 56.4 Fall (2014): 701-723.

Soja, Edward W.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Oxford: Blackwell, 1996.

Sweeney, Kevin W.. “Competing Theories of Identity in Kafka's *The Metamorphosis*.” *Mosaic* 23.4 Fall (1990): 23-35.

Tuan, Yi-Fu. *Place and Sp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77.

Warner, M. “Kafka, Weber and Organization Theory.” *Human Relations* 60.7 (2007): 1019-1038.

曾艳兵: 《卡夫卡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年。

[Zeng Yanbing. *On Kafka*.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责任编辑: 李敏锐